

第一輯

中华幼学文库

马光琅 编校

1222

220

千家詩

• 中华幼学文库 •

千家诗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邮编 300071 电话 3508542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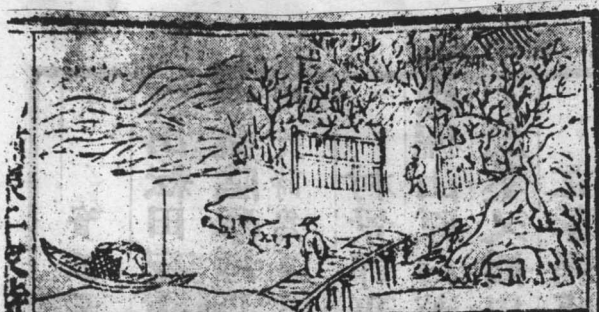
开本:850×1092 1/32

印张:9.625 插页:4

字数:166千 印数:1—4000

ISBN 7-310-00795-6

G·124 定价:11.20元



國朝千家詩卷上

金陵眠雲堂梓行

春景

春遊訪友

方殿元

袁卓甫
閩人

輕舟一路遶烟霞
不爲尋君也留住

更愛山前滿欄花
那知花裏卽君家

蘇臺

宋

樂玉才常
熟人

十里珠簾映碧流

絲絲金綫拂船頭

問門過去盤門路

一樹垂楊一畫樓

金陵寺看花

余

懷
心人

《國朝千家詩》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金陵眠雲堂刊本。

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卒諡文穆有石湖集

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

傍桑陰學種瓜

元編卷十四地理類田元作苗種瓜集作賣瓜童孫各本作兒童今改正

按此詩為夏日田園雜興十二首之一

村景即事

謝完璧坊本作范成大而石湖集不載今據西溪叢話改正

綠徧山原白滿川子規聲裏雨如煙鄉村四月閒人少纔

了蠶桑又插田

立春偶成

張栻栻字敬夫廣漢人浚子以蔭補官歷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撫使卒嘉祐中

《重編千家詩讀本》

清·宗廷輔編注，光緒二年(1876)刊本。



故地而不問置祖宗大仇而不報可勝惜哉

西湖

畢竟西湖六月中

接天蓮葉無窮碧

風光不與四時同

映日荷花別樣紅

蘇軾

東坡出守杭州咏湖之作言西湖之景當六月之時風光雪物之佳麗非四季之可比蓮葉滿湖接天之碧而無窮際荷花貼水映日而紅粧嬌豔則有一般丰韻荷花如此其媚之美可知矣

湖上初雨

蘇軾

水光瀲灩晴偏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粧濃抹也相宜

漱瀾水光之瀲灩也空濛山色之霏微也西子古美人此言西湖佳景晴雨皆宜湖光瀲灩映日而波紋蕩漾方喜其晴之可愛忽而山色空濛烟雨霏微難雨亦有可觀也吾見

《增补重订千家诗注解》

宋·谢枋得选、清·王相注，上海五洲书局石印本。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年刻

幼學詩

《幼学诗》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刊印。

序

来 新 夏

幼学之名，始见于《礼记·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孟子·梁惠王下》也说过“夫人幼而学之”的话。又因为它是启人之蒙昧，故又称蒙学。它的发展史实在不短，从周秦时就已开始。求知要读书，读书必先识字，字且不识，遑论其他。所以幼学必先从识字入手。根据现存的最早一部古代目录书《汉书·艺文志》小学部分的记载，汉前识字课本已有十家三十五篇，最早的是《史籀篇》，接着有《苍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汉代合三篇为一，总名为《苍颉篇》，又称三苍。时又有《凡将篇》和《训纂篇》之作，但均已亡佚，仅后世辑有片段。现能见到的最早识字课本是汉元帝时史游所撰《急就篇》，以三、四、七言押韵，主要记名物，偶或涉及伦理道德。继起者为南朝梁周兴嗣所撰《千字文》，全文千字，除一“洁”字外无一重字，四言叶韵，极富文采。其内容包括社会历史和伦理道德。唐代的幼学教育发展更为完整、系统。它包括识字、知识、道德三大内容，出现了一批如《太公家教》、《女论语》、《兔园册》及《蒙求》等幼学读物。直至清代，基本模式无大改变，仅仅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幼学读物的品种有所增加，如宋代增加了《百家姓》、《三字经》、《十七史蒙求》、《名物蒙求》、《千家诗》及《书言故事》等；明清时期，又沿

着唐宋的路子，陆续出了一些新的蒙学书，如《小儿语》、《弟子规》、《鉴略》、《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及《昔时贤文》等等以应不同需求，其中《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千家诗》几乎是人们公认的入门必读书。这些读物不论其内容，学习顺序和使用时的施教方式都是适应正规教育需要的。

与正规教育之路并行的幼（蒙）学教育，还有一条业余教育之路。它的读者不限年龄，不拘身份，男女老幼都可以选择这条识字途径。这种所谓幼学教育不是从年龄立意，而是指扫盲性质的启蒙教育。这是一条非正规的业余教育之路。它的主要读物就是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以不同句式编排的各种“杂字”。“杂字”虽然在正规教育中也作为不准备走仕途者的一种读本，但历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可是，它确是传统幼学教育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数量很多，有全国通用的，也有地方独有的。内容深浅不一，范围不同。作者大多佚名，可能以其为小道，但大文学家蒲松龄却撰写了一本三十一章一万四千字的《日用俗字》（已收入《蒲松龄集》），讲了很多做人的正确道理，是杂字中的上品。

对于这些传统幼学教育读物，历来在一些学者文人的著述诗文中时有涉及，但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则为时较晚。我先后读过常镜海先生的《中国私塾蒙童所用课本之研究》和张志公先生所著《传统语文教育初探》，深感欣悦。这是两本内容丰富、说理透彻、论述系统的佳作，象把一团乱发梳理成一条光油油的大辫子那样惹人喜爱。但是按他们所附书目去求书还很不易。不过，在“文革”扫四旧的年代里，这些读物却被作为批判对象，大量印行，几乎泛滥成灾，从反面给了不少人以传统幼学教育，万万没有想到无心插柳，竟然成林。近些年，在弘扬传统文化的

美丽旗下，公私各种渠道大印特印，不管内容错漏，装帧粗劣，“三百千”云云，充斥市场。这是弘扬，还是糟蹋？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困惑。我总想为什么不认认真真、堂堂正正地整理出一套可供保存文献，以应去粗取精之需的传统幼学教育资料呢？可是，在出版事业回翔于低谷之际，有谁肯于乐此不疲地为朦胧的希望付出劳动呢？又有哪些出版界的明智之士肯于挑起这付成败难卜的重担呢？

柳暗花明又一村，似乎是一句安慰话，但有时又似是幸运之神的有意安排。素来不热衷于过眼烟云的“畅销书”而独钟情于长销书的南开大学出版社的有关人士却注视到这一冷漠的角落，正策划编制一套传统幼学教育读物，并真诚地邀请我为主编。这真是意料未到的东风。这些读物虽然有其一定的历史与时代的局限，但它却反映了历史上不同时代文化教育的某些侧面；这些读物的内容虽然不全为现实所需要，但披沙拣金也颇有可供借鉴之处。应该说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处宝藏，因为它不仅是千百年来世代相传的群众读物，而且在宋时已传入日本，清初又传到东南亚、欧洲和北美。现在某些国外大学仍将其作为汉语专业的初级读物，最近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儿童道德”丛书之中。于是，我约了几位能合作的朋友共议其事，选取各时期为较多人熟悉的代表作和流传稀少的版本，经过校勘、标点和整理，编出一套《中华幼学文库》，力求达到传统幼学读本的善本标准，把它献诸当代社会，传留后世子孙。这一设想不久就正式投入工作运转的轨道。

三、百、千、千因流传较广，本子较多，所以搜求选取比较容易；但是，我一直主张要把杂字列入，以求完整。可是“杂字”类读物原未受到重视，收藏者少，亡佚者多，在

确定收列杂字一类时，的确遇到相当困难；但声应气求，终有芳草。经老友杨大辛先生和“杂字”收藏家王慰曾先生的协助，不数日而自王先生处取得数种。其中天津味十足的天津杂字，尤富地方特色，内容亦趣味盎然，实为难得。我也曾因合作共事关系而识张志公先生哲嗣国风，复自志公先生处获得几种，最为可感的是其中有明万历时刊印的杂字。这展露出志公先生乔梓慷慨借书的读书人本色。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高鸿钧先生相识多年，也概允复印其馆藏杂字等件，这在过去也许不算什么，可现在却是了不起的义举。真是意想不到，原以为难度最大的杂字搜集工作，因众人添柴而大有所获，所得资料不止可编一册，还能编二、三册。也是一个意想不到，原以为《百家姓》没有什么寻觅材料的问题，不想理应收录的《皇明千家姓》这一种极富时代特色的代表作（只有北京图书馆入藏），却在“文革”时因系明初刻本被某权贵索去，至今不知下落。无可奈何，只能付诸阙如。

我当过几种书的主编，毁誉不一。但有一条是共同的，那就是“主”得太多，又删又改，又增又减，往往落个吃力不讨好的结局，可悲也夫！不久前，我读到韩锡铎先生主编的《中华蒙学丛书》。这是一部有四十余人参加，收书七十余种，每种加有说明和注释，共达三百万字的巨帙。费时耗神，自在意中，尚未遍读，未敢雌黄；唯独对韩先生序中有一段话颇有领悟。韩序有云：“审稿时对部分书稿虽然作了某些加工，但毕竟不能越俎代庖，只能文责自负了。”这真是得道之言，应该择善而从。因此，这一套文库的各种应当由各编校者“文责自负”了。

第一辑五种是各编校者冒酷暑的挥汗之作，颇著辛劳，但幼学读物数量众多，丰富多彩。我希望二辑、三辑也能随之而与读者见面。这些读物虽为启蒙所用，但是，随

着时代发展，社会变化，语言故实与现实生活距离日远，青少年、大学生也许未必能全部读懂，所以选材时尽可能选入些注本，另在卷首撰写《前言》，正文加了标点和必要的注释与校勘，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为使海内外炎黄子孙共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之中，立繁简二体，各取所需，用心当蒙读者谅解。此书不仅可供幼学者阅读，也可备老人作儿时的回忆，即为人父母者若有分析地以此教读子女，则尤胜于遗金于子孙。

写序本不容易，写总序尤难。我写过一些连自己都不满意的序，总感到馆阁味太浓，像穿着一领旧长衫徜徉于弯曲的古道上。所以我在写这篇总序时就想洒脱一点。但是，东施效颦，自己仍感到有点像放大了的小脚那样。不过，最后还是把它放在《中华幼学文库》第一辑前面，作为序。我在序末不想说什么“如有不足之处……”之类的套话，因为我们确曾尽力克服不足。但是我们却真挚地希望读者挑剔苛求，那将鞭策我们走向“十足”的佳境。

一九九五年春节于南开大学遼谷

前 言

《千家诗》在传统的蒙学读物中，以它独具的风骚吸引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使它与家喻户晓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三、百、千、千”。

《千家诗》是旧时为儿童编选的启蒙性教材。这种诗体的童蒙读物，是适应儿童教育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而流传的。古代童蒙教育，大体上是先从识字开始，比如念《急救篇》、《千字文》等识字书；在认识了一定数量的字之基础上，再让儿童吟读、背诵一些比较浅显易懂的诗，这就出现了诗体教材。诗体读本（不是通常意义的诗选本），被社会认可，被重视起来，大约是唐宋以来的事。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黄金时代，写诗成了一代风气；唐王朝选拔人材，采用的是科举取士这一从隋代开始的制度，而唐代特重进士科，进士科考试从唐玄宗开始又是要考诗的，于是，从唐开始文人盛行写“试帖诗”。为了适应社会风气，使子弟、弟子将来有个锦绣般的好前程，就从孩提抓起，先让他们读诗、背诗，然后再训练作诗技巧、写“试帖诗”。到后来，虽然宋代进士科不再考诗赋而改试经义，明代则以八股文取士，但选学一些浅近的诗仍仍是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就出现了不同的诗体教材、范本。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比较早的诗体教材，是唐代末年胡曾的《咏史诗》。这一百来首诗，形式是七言绝句，内容多是历史事迹和诗人感慨，语言是通俗的。这本读物流传到明代时，同《蒙求》、《千字文》一起作为蒙书被编注为《释文三注》。这只是胡曾一家诗，题材也比较单调。到宋代才有“千家诗”这一名称。最初以“千家诗”命名的蒙书是《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到了清代，它由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刊刻于《楝亭藏书十二种》，题“后村先生编集”（“后村”是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的号）。这本诗选，所收家数大大扩展了，诗的内容丰富多彩，全书分成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人品十四门。编集者把读诗和长知识、开阔视野、注意品德修养结合起来，可见其为儿童的成长用心之良苦。《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评述此书“所选亦极雅正，多世所脍炙之什”后，也指出它有一些错谬，如将传诵的七律“截去半首，改作绝句”，甚至张冠李戴，诗人“姓名不符”的，但瑕不掩瑜，仍流传很广。在这本诗体蒙学读本的影响下，后来出现多种“千家诗”，但大都是在这个本子基础上或增或删选编的，如《增刻千家诗选》（游光鼎）、《千家诗注》（黎恂）、《千家诗对类合订》（王方城）、《重编千家诗读本》（宗廷辅）等等；还有些与书法艺术结合起来的，如题李卓吾书《草书千家诗》、题董其昌书《千家诗草书》、李光明庄刊《四体千家诗》。在众多的“千家诗”选本中，最受欢迎的本子是五七言合编为一集的《千家诗》。这个本子，因又加印上了形象生动的诗意图，名为《绘图千家诗》。

五七言合编本，其中七言部分，分上下两卷，七绝七律各一卷，在同五言合集之前，就称《千家诗》。《通俗编·文学》介绍：“今村塾所谓千家诗者，上集七言绝八十余首，下集七言律四十余首，大半在后村选中，盖据其增删之耳，故诗仅数十家，而仍以千家为名。”七言部分，《绘图千家诗》题为谢枋得选、王相注。谢枋得生活在宋理宗宝庆二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号叠山，与文天祥同科进士，为人豪爽，好直言；曾率军抗元，失败后以卖卜教书度日；宋亡不仕，元统治者逼迫他到大都后，绝食而死。他是南宋颇有名气的诗人，在七绝卷中，就有他的《庆全庵桃花》、《蚕妇吟》两首。其经历、人品恐与他热心重编这本童蒙教材有关。他是宋人，而七律卷中却有《送天师》（宁献王）、《送毛伯温》（明世宗）两首明人诗，这是《千家诗》在流传刊刻过程中有增删的又一例证。五七言合编本的五言部分，是王相选编并下注释的，原为单独刊行本，称《五言千家诗》，也分上下两卷，五绝五律各一卷。王相是清代人，字晋升。他于康熙四十八年编成的《尺牍嚶鸣集》，所选明末清初简札，“大抵轻佻纤巧”，从中亦可窥见其审美情趣。

由谢枋得选、王相注的七言《千家诗》和王相选注的《五言千家诗》合刊后，仍称《千家诗》。所谓“千家”，仍如以前，只不过言其所选诗家之众多罢了，实际上入选的诗人只有一百一十八家，选入的诗作只有二百二十三首。这本蒙学读物，就是在新学堂取代了私塾、新文化盛行后，它在民间仍流传不绝。张志公先生曾说它“几百年来风行全国，家喻户晓的程度，简直不亚于‘人之初’、‘赵钱孙李’和‘天地玄黄’”。

其所以有如此强的生命力，是因为：一，入选的作品，多为唐宋两朝各家之名诗，是学童的父兄、先生所经常吟诵和乐于传播的诗篇，名作的社会效应使儿童在学诗的起始阶段就引起对诗的爱好。二，所选的诗，体制短小，节奏感强，韵律和美，读起来琅琅上口，抑扬顿挫，好听好记又好背；而且大多比较浅显易懂，小读者虽还不能尽得诗中奥妙，但真是开卷有益，对个中滋味总有所领悟，这自然会激发读诗的兴致。三、所选诗，有写景的、抒情的，有咏史的、送别的、怀乡的、思友的、感慨时事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读来屡有新鲜感，饶有兴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儿童厌恶单调呆板、喜欢新奇多变的心理，使他们读起来乐此不疲。另外，后来给《千家诗》加印上了精美的图画，每页都有诗意图，增加了这本蒙学读物的趣味性和启迪性，使儿童可以把诗的意境与画面的可视形象结合起来，去思索，去联想，去欣赏，这对于《千家诗》的流传也不无影响。

这本在旧时曾风光了很长时间的《千家诗》，的确在蒙学教育及传播文学遗产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且至今仍有它的价值，研究传统文化就不能不涉及它；但从蒙学角度观之，《千家诗》还算不上是本理想的完美的启蒙读本。入选的诗，有少量作品或表现了一种出世向佛求仙的思想，或反映了某种及时行乐的思想。这类诗，尽管有的曲折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人世的不平，不乏社会意义，但作为儿童时期的读物，却是不妥的。还选入一些以效忠皇帝、粉饰太平为内容的“应制诗”，以及描述得宠时得意心态的诗。选入这类诗，自然反映了选编者的向往之情；但同时也是要

以此来激发学童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接受启蒙教育的时期就同未来的前程联系起来。读书——求取功名——为朝廷效力，这是封建社会几乎所有读书人要走的道路。另一本童蒙读物《神童诗》中，就说得相当直捷了当：“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写了不少应制诗，因“文翰显时”，身居高位，而为人们所羡慕所效法。旧时的现实如此，所以选入这类诗，并不奇怪。但我们现代人看来，其思想内容，显而易见是落后的消极的，有的还有几分庸俗气。其他尚有少量入选的作品，或因寓意深刻、过于含蓄，或因用典多、故实生僻，或因有释道用语，难读难懂，并不适合作童蒙教材。以上是选材方面的问题。至于诸如把《有约》的作者赵师秀误为司马光、《晚楼闲坐》的作者黄庭坚误为王安石、《东湖新竹》的作者陆游误为黄庭坚，以及任意改动诗题、诗句有误等问题，也颇有一些。王相的注释，将作者的字号爵里弄错的有之，解释肤浅的有之，穿凿附会的亦有之。像王绩的《野望》，本就是一首写景抒情的诗，注者却一一比附为当时的政治情势：认为“‘簿暮’，言隋祚已尽”，“‘树树秋色’，比隋末群雄割据，皆不以仁，如秋天肃杀之气而无阳春之暖”等等。这是注释方面的问题。但从整体上看，《千家诗》还是一本比较好的童蒙诗体读本，它的思想内容、艺术魅力，不是《家常语》、《小学诗礼》、《蒙学诗教》、《小学诗》等用诗歌形式写的童蒙读物可比的，所以一直流传不废。

我们所收录的《千家诗》，基本上是《增补重订千家诗注解》和《新镌五言千家诗笺注》合集本的原貌，

只是略作了一些必要的改动：一、芟除了赘入的两首明人七律。二、给诗文、注释加上了标点。三、作者有误的，予以更正，并相应改动了注文中有关作者简介的内容（如《伤春》“准拟今春乐事浓”本是杨万里诗，却归为杨简之作，在更正作者同时，删去杨简的简介，添补上了杨万里的简介）。四、注文中，由于刊刻不慎词语有误者（如将“荆公”误为“前公”，将“五侯”中的“王立”误刊为“王音”），径直作了更改；至于注文不妥的，则以加按语方式予以说明，或略作删节。五、诗题、诗文中的词语与通行的诗集有异者，未敢径行改动，依据《全唐诗》、《四部备要·十八家诗抄》、《宋诗纪事》以及诗人文集，在诗的注文末，用括号冠以“编校者按”，予以说明，如韦应物《答李瞻》注文后，加“【编校者注】《全唐诗》题作《寄李儋元锡》，第二句为‘今日花开已一年’”。

吴小如先生在《古诗词多依托》一文中，述及《千家诗》作品的真伪问题时说：

宋代末年有好几部《千家诗》行世，其中作品虽家喻户晓，而其真伪却很值得推敲。最有名的如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一首，不但不见于杜牧《樊川集》，连他的《外集》、《补遗》都不收。我一直怀疑其作者并非小杜，尽管其诗本身久已脍炙人口。又如题为苏轼作的《花影》七绝，亦不见于《东坡全集》。终宋之世，苏诗一直为世所重，倘《花影》确为苏轼所作，则施元之、王十朋等人注苏诗时不容任意刊落。可见十之八九出于依托。（《今晚报》1994年8月25日）